

中国情境下的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

——基于荟萃分析方法的检验

文 宏 李风山*

【摘要】当前，学界对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之间的关系认知存在较大分歧，研究结论莫衷一是。论文使用荟萃分析方法，对中国情境下的49篇中英文定量文献，共107个效应量、12044个样本进行整合性检验，考察地方领导人的年龄、任期、学历、任职来源和行政级别对政策创新扩散的影响。研究表明：（1）在主效应检验上，任期、任职来源和行政级别对政策创新扩散具有积极效应，但年龄、学历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并不显著。（2）在调节效应检验上，政策类型在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中起到调节作用，出版属性和领导人选择的调节作用不显著。这些结果表明，要审慎地看待现有研究关于地方领导人特质对政策创新扩散影响的实证结果，在后续政策创新扩散的研究中，也应更加审慎地提出关于这些变量间关系的研究假设。从研究贡献来看，论文首次运用荟萃分析方法检验了中国情境下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为二者之间的关系认知分歧提供了一个方向性的共识，有助于为后续探讨政策创新扩散与其他变量的关系研究提供理论指引，同时也能够为政策创新扩散的顶层设计提供参考。

【关键词】政策创新扩散 地方领导人特质 荟萃分析 中国情境

【中图分类号】D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2486 (2023) 06-0111-21

* 文宏，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李风山，华南理工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感谢匿名评审专家、编辑部提出的建设性修改意见。本文曾在第三届“理解中国公共政策”工作坊上报告。感谢冷向明老师、李婷老师的点评和有益建议。文责自负。

基金项目：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重大攻关项目“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的城市治理研究”（21JZD037）。

一、问题的提出

自 Walker (1969) 将政策创新扩散的概念界定为“地方政府对某一创新活动或政策的采纳过程”后,在过去的半个多世纪里,政策科学领域涌现出大量政策创新扩散的研究^①。这些研究发表在政治学或社会学等领域最顶级的期刊中,被社会科学研究者广泛引用 (Welch & Thompson, 1980; Zhu & Zhao, 2018; 朱旭峰、张友浪, 2015; 马亮, 2015)。尤其是近 20 年来,政策创新扩散的相关研究更是急剧增加。这些都表明,政策创新扩散已经成为政策科学领域最受关注的核心议题之一 (Graham et al., 2013)。

在这些研究中,有比较多的学者致力于解释政策创新扩散的影响因素,他们围绕政策企业家、政策属性、府际关系等因素,展开了细致而又深刻的分析,为理解政策创新扩散的动力机制提供了丰富的知识。例如,朱亚鹏 (2014) 从政策企业家切入,通过剖析医保政策创新的过程,揭示了中国地方政府创新过程的复杂性,深化了理论界对地方领导人行为逻辑的认识^②。在这之后,他又认为西方政策创新扩散研究的结论,普遍建立在联邦体制的基础上,与中国的政治体制有非常大的区别,对中国的政策创新扩散过程缺乏很好的解释力。因此,他基于我国棚户区改造政策扩散的案例分析,认为政策的相对优势性和兼容性动态影响着政策创新扩散的速度和范围,为理解中国情境下政策属性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提供了证据 (朱亚鹏, 2016)。

除了建立在案例基础上的定性研究,还有一大批政策创新扩散的定量研究运用事件史分析方法,用大样本数据检验了不同因素对政策创新扩散的影响机理 (Zhu & Zhao, 2018; 朱旭峰、赵慧, 2016; 马亮, 2015), 为学界从微观层面上认识政策创新扩散机制提供了一些证据。这些研究不仅致力于探索政策创新扩散的邻近效应、竞争效应、压力效应等内容,也同时关注到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他们大都承认地方领导人特质对政策创新扩散有影响,但在结论方面却莫衷一是,甚至是互相冲突。例如,在地方领导人的任期特质方面,有研究认为地方领导人的任期变量每增加 1 个单位,政策创新扩散的概率就提高约 1 个单位 (唐慧、王印红, 2021); 但也有研究并没有发现证据

① 由于政策扩散与政策创新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尤其是政策扩散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政策创新。因此,为避免概念使用的混乱,本文统一使用政策创新扩散作为表达概念。

② 本文中的“地方领导人”是指中国某一行政辖区内的党政领导者,一般是指市委书记或市长。而下文中的“地方领导人特质”则代指市委书记或市长的年龄、性别、学历、任职来源、行政级别。

能够说明两者之间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韩啸、吴金鹏，2019）。在地方领导人的年龄特质方面，有研究认为决策者的年龄越大，执政经验和可支配资源越丰富，越有助于其采纳新政策（Kearney et al., 2000）；还有研究认为两者应该是倒U形关系，经验和资源对地方领导人的创新采纳产生积极影响，直到它削弱了其适应了的组织实践和惯例的意愿（Damanpour & Schneider, 2009）。除此之外，在地方领导人的学历、行政级别、任职来源等因素上，也都没有形成共识性的结论。

总体而言，目前学界对于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之间的关系认知存在较大分歧。鉴于此，致力于澄清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之间的关系，成为政策创新扩散研究的一个新方向。为弥补这一研究不足，本文将运用荟萃分析（meta-analysis）方法，整合中国情境下政策创新扩散研究的大样本，重新检验两者关系，并综合考虑政策类型、出版属性和领导人选择对两者关系的调节效应，真正识别、厘清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

选择中国情境下的政策创新扩散文献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方面，中西方体制和文化的差异导致不同情境的政策创新扩散研究的样本对象、变量测量等都具有很大差异，将所有结果整合起来会造成研究误差的增大。例如，在中国政治晋升体制中，年龄是影响官员晋升的重要因素。中国官员晋升的“七上八下论”虽没有明文规定，但这种非正式晋升规则却与官员心理和行为有着十分微妙的关联。此外，在官员任期上，寻求连任或晋升的官员，也会在政治任期的不同时间节点上表现出不同的行为逻辑。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另一方面，选择中国情境下政策创新扩散的文献，并不意味着只选择中文文献作为研究对象。当前，很多基于中国情境的荟萃分析研究，都自然地忽略了英文研究中的中国样本，缺乏对这些研究的检索和分析，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研究的信度。与之相比，本研究不仅检索国内重要数据库中关于政策创新扩散的中文文献，而且将发表在英文期刊上的关于中国政策创新扩散的研究纳入分析过程，以使本研究的结论更加准确。

二、研究假设

（一）地方领导人特质的主效应假设

基于定量方法的政策创新扩散研究，虽然很少专门探讨地方领导人特质对政策创新扩散的影响，但在研究其他变量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时，却汇报了多种地方领导人特质对政策创新扩散的影响结果，这些研究为开展本次荟萃分

析提供了直接和丰富的数据支撑。综合已有政策创新扩散的定量研究，发现较多研究关注到了地方领导人的年龄、任期、学历、任职来源、行政级别等特质。因此，本研究将重点关注这五个变量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

1. 年龄特质

地方领导人的年龄特质对于其心理和行为的影响是非常深刻的，被认为是领导人的重要特质之一（Mintrom, 1997）。这是因为超过一定年龄的领导人常被认为没有晋升的希望，其创新的内在动力也会明显降低。根据年龄-风险偏好理论可知，年龄越大的人越保守，对新事物的接受意愿更低，承担责任风险的成本越高。相比而言，年轻人更具有冒险精神，更倾向于接受新事物（Vroom & Pahl, 1971；Bantel & Jackson, 1989）。也有学者比较调查了年轻人和老年人在选择困境任务中的冒险行为，最终的结果表明年龄较大的人（无论男女），都明显比年轻人更保守（Wallach & Kogan, 1961）。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年龄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呈负相关关系。即年龄越大的地方领导人，越不愿意推动政策创新扩散；越年轻的地方领导人，越愿意推动政策创新扩散。

2. 任期特质

在中国政治体制中，晋升是地方领导人关注的核心目标之一。职务晋升的激励在某种意义上会持续、稳定地引导着地方领导人的行为。如果在特定时期，这种激励效应降低或弱化，地方领导人创造政绩的动力就会降低。因此，一种观点认为新上任的地方领导人往往希望更多、更快地做出政绩，而任期较长时间的地方领导人则会偏好稳定履职，以至于经济绩效降低（王贤彬、徐现祥，2008）。与此同时，新近一项荟萃分析强调，不少学者所认为的倒U形关系其实并未得到充分检验，提醒学界应谨慎应用这一结果（董志霖、闫泽华，2020）。事实上，更多的学者通过实证分析，也得到了地方领导人的任期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之间呈负相关关系的结论（唐慧、王印红，2021；朱旭峰、张友浪，2015）。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任期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呈负相关关系。即任期之初的地方领导人，对政策创新扩散保持较强的偏好性；任期之末的地方领导人，政策创新扩散的动力不大。

3. 学历特质

在公共政策的决策过程中，地方领导人的受教育水平对其政策偏好、认知倾向性具有显著性的影响。学界普遍认为，教育水平与认知能力有关，较高教育水平的人对于创新方案的提出和接纳程度也会比较高，即受过更多教育的人

被认为对创新具有更强的接受程度（Kimberly & Evanisko, 1981; Bantel & Jackson, 1989）。这种关系表明，学历越高的地方领导人对政策创新扩散的接受程度可能就越高。这一观点在危机情境中复工复产政策扩散的研究中也得到了充分验证（吴克昌、吴楚泓，2022）。还有学者在探讨决策咨询制度扩散的议题时认为，地方领导人的学历越高说明其与高校专家建立的社会关系越多，也就更有可能向专家学者征求咨询，也就越有利于政策创新扩散（韩万渠，2019）。由此可见，学历水平越高的地方领导人对创新的理性认知越全面，对创新型政策的偏好就可能越强。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3：学历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呈正相关关系。即地方领导人的学历越高，就越有可能推动政策创新扩散；学历越低，对政策创新扩散的推动偏好就越弱。

4. 任职来源特质

根据我国领导干部交流制度规定，对于缺乏基层工作经验、岗位经历比较单一或任期超过10年的处级领导干部，一般应当有计划地交流。这种干部交流制度推动了干部的空间流动，而基于干部交流制度生成的任职经历或来源则被认为是影响地方领导人施政风格的重要因素（朱光喜、陈景森，2019）。例如，有研究者认为地方领导人如果来自于其他省份调动（横向调动）或中央下派（自上而下调动），则会将在原工作单位的偏好带到现单位，而自下而上产生的地方领导人，则更偏向于遵循原领导的工作做法（朱旭峰、张友浪，2015）。由此可见，任职来源对地方领导人的政策偏好具有一定影响。也有不少学者在政策创新扩散研究中提出了“地方领导人如果来自于上级政府或同级部门，则更倾向于推动政策创新扩散”的命题（唐慧、王印红，2021；刘佳、刘俊腾，2020；Zhu & Zhang, 2016）。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4：任职来源与政策创新扩散呈正相关关系。即地方领导人来源于上级政府或同级部门，则政策创新扩散的可能性更大；如果是自下而上产生的，则不利于政策创新扩散。

5. 行政级别特质

一般而言，在压力型体制设计下，行政级别越高的领导人，其权力和可支配资源的能力就越大，他们在政策制定和执行过程中受到的阻碍也就越小。对此，有研究者认为城市行政级别显著提升了城市生产率的整体水平，高行政级别的城市在经济效率上表现出更高的水平（江艇等，2018）。在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扩散的研究中，有学者认为相较于普通地级市，副省级及以上的城市有更好的经济基础，同时也能够对其他地方形成示范效应，所以这些地方的领导人在政策创新扩散上会表现得更加积极（雷叙川、王娜，2019）。因此，有理由

相信，地方领导人的行政级别越高，其执政经验越丰富，调配资源的能力就越强，在推动政策创新扩散的阻力上就相对较小，也就更有能力去实现政策创新扩散（王洪涛、陈洪侠，2017）。基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5：行政级别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呈正相关关系。即地方领导人的行政级别越高，越有可能出现政策创新扩散；行政级别越低，政策创新扩散的可能性越低。

（二）研究特征的调节效应假设

1. 政策类型

已有研究较多地关注了政策环境对政策创新扩散的影响，却在一定程度上忽略了政策本身的因素，难以回答不同政策在同一地区扩散差异的形成机制。为此，不少学者将注意力放在政策属性对政策创新扩散的影响上，认为政策的复杂性、兼容性、可观察性、相对优势和可试验性等性质，会影响政策扩散的广度和速度（Shipan & Volden, 2012; Makse & Volden, 2011）。例如，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防控风险的政策就会得到更好的扩散（王法硕、张恒朋，2021）。还有研究区分了两种不同类型的政策创新，分别是聚焦于自身的政府创新和围绕公共服务产品的社会治理创新（刘景江，2009）。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可以将政策划分为两种类型：政府体制改革类和社会治理创新类。相较于社会治理创新类政策而言，由于政府体制改革类政策涉及政府内部复杂关系的调整，面临的阻力一般会比较大会比较大，所以政策创新扩散的难度也就更大。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6：政策类型能够调节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即相较于政府体制改革类政策，社会治理创新类政策背景下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的相关程度更高。

2. 出版属性

根据文献的出版属性，可以将所有文献分为两类，一类是发表在期刊上的出版论文，一类是未发表在期刊上的学位论文或工作论文等未出版论文。相较于未出版论文而言，出版论文要经过更为严格的质量审查，文章的质量能够得到更多保证。但在学术发表世界中，期刊和读者更偏爱具有显著性统计结果的论文，这使得很多不显著的统计研究未能发表在期刊上。此种发表偏好可能会给研究结论带来一定的偏差。因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7：出版属性能够调节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即出版的研究比未出版的研究，更能使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表现出更高的相关程度。

3. 领导人选择

通过对政策创新扩散定量文献的归纳，发现不同研究中对地方领导人的选择有所差异，有的研究将党委书记作为主要测量对象（唐慧、王印红，2021；Zhu & Zhang，2016），有的研究则考虑的是行政长官（刘佳、刘俊腾，2020；韩啸、吴金鹏，2019）。这种差异可能会影响研究结论的差异。尤其是在我国地方政府中，党委书记多被认为是“一把手”，对政策议程的选择和制定拥有更大的话语权。相较于地方行政长官，党委书记对政策创新扩散的影响程度可能会更大。鉴于此，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8：不同领导人的选择能够调节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的关系。即用党委书记作为地方领导人时，在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上会强于行政长官的影响作用。

由上述研究假设可以归纳本文的分析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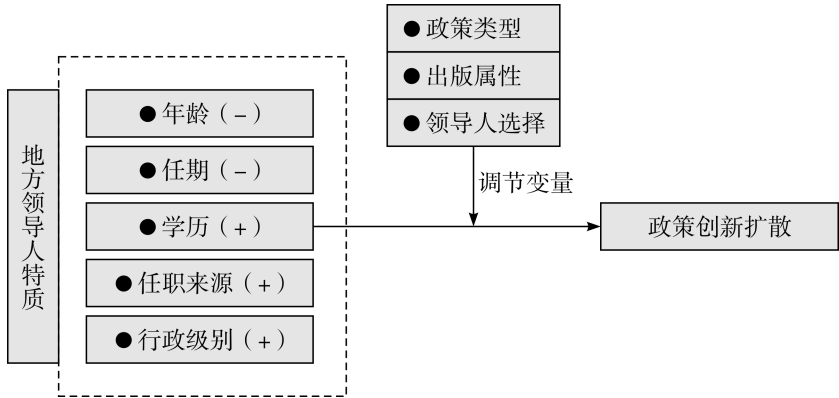


图1 研究模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研究设计

（一）研究方法

荟萃分析意为“分析的分析”，是一种将以往研究中某些变量关系的数值进行萃取、计算和整合的定量型综述方法，多被用来纠正已有研究的偏差（Glass，1976）。长期以来，社会科学研究的可复制性或可重复性备受质疑，如何最大程度地接近真理，是社会科学研究者的努力方向。为了回应这一问题，循证分析应运而生，蕴含循证分析理念的荟萃分析随即也被开发了出来。荟萃分析最初被应用于医学领域，用来对比检验不同药品或治理方式的效果。其中，卡尔·

皮尔森（1904）率先在医学领域内对疫苗的有效性进行了探讨，他不仅开发了相关系数，而且在整合多项数据的基础上得出其他疫苗比新疫苗更有效的结论，被认为是首位使用荟萃分析思想的学者。总体而言，荟萃分析往往建立在大样本的定量研究基础之上，规避了过往定性文献综述因过于主观化带来的不足，是一种相对客观、准确、可复制的研究方法。但目前来看，这一方法在公共政策领域的应用还比较少，未来还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本文选择荟萃分析作为研究方法，主要是考虑到当前研究对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认知分歧较大，急需一种整合性的研究方法来回应这一分歧。从方法角度来看，荟萃分析基于定量研究的效应值开展，本质上是对定量文献的系统性综述，通过整合对同一问题进行探讨的不同研究，来增加总体上的样本量，识别变量之间的关系，能够很好地整合对同一问题的矛盾性解释（Fagard et al., 1996）。因此，在分歧性研究问题上，荟萃分析具有比较强的方法适配性。通过荟萃分析，本文不仅能够为争论已久的两者关系认知提供新的证据，而且有助于为后续研究政策创新扩散与其他变量的关系提供理论指引。在此基础上，本文还能为政策创新扩散的顶层设计提供参考方向，将理论研究真正与现实实践联系起来，发挥理论研究的指导作用。

（二）文献检索与数据收集

文献检索与数据收集是荟萃分析过程中的关键环节，因为样本文献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影响着荟萃分析结果的信度与效度。在全面、规范的文献检索程序基础上，将所有符合研究议题的样本纳入分析过程，对于保证分析的准确性和无偏性至关重要。为将中国情境下的地方领导人特质和政策创新扩散的研究全面纳入分析过程，本研究充分检索了国内外常用的数据库，以最大范围地收集两个变量关系的定量数据。

首先，在中国知网数据库中按照“主题 = 政策创新扩散”或“主题 = 政策扩散”或“主题 = 政策采纳”的表达式进行检索，共获取 621 篇中文文献。与此同时，在常用英文数据库（Web of Science 核心合集、Springer、Scopus、EBSCO、Elsevier、谷歌学术）中，按照“Subject = Policy diffusion”或“Subject = Policy Adoption”检索，共获得 50877 篇英文文献。其次，由于大多文献并不能满足荟萃分析的要求，所以需要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筛选。筛选标准包括：一是剔除与“政策创新扩散”无关的文献，二是剔除非定量研究的文献，三是剔除多个数据库重复检索到的文献，四是剔除非中国样本的文献。由于工作量庞大，笔者邀请两位研究者通读标题、摘要和关键词进行筛选。经过筛选，共获得 259 篇中国情境下政策创新扩散的定量研究。再次，由于这些文献可能并

未包含地方领导人特质的变量,或未报告相应效应值,抑或是使用了重复样本,需要对这些文献进行再次筛选,筛选方式为阅读全文。经过此次筛选,共有44篇文献可以被纳入荟萃分析,其中中文文献有36篇,英文文献有8篇。最后,在检索过程中,通过对参考文献的追踪检查和数据校对,以及对特定学者(如朱旭峰、马亮、易洪涛、张友浪等)进行针对性检索,再次纳入3篇中文和2篇英文文献,共有49篇文献被最终纳入到分析过程,总样本量为12044个(如图2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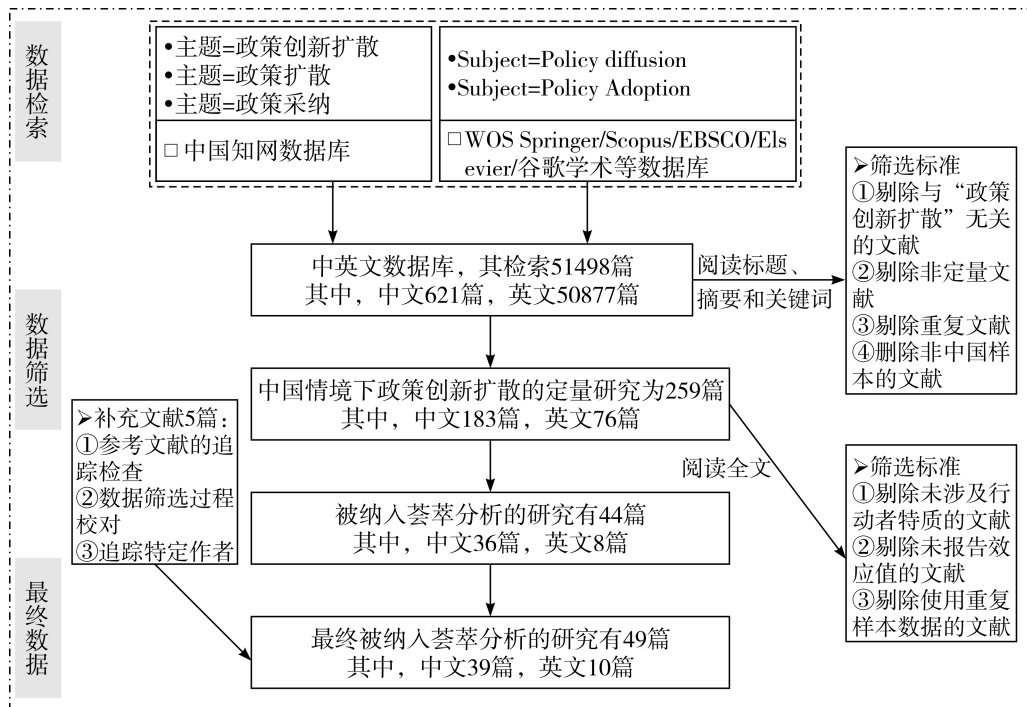


图2 文献筛选流程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三）文献编码与效应值转化

依据荟萃分析步骤,笔者对数据进行了录入,并制定了编码表。编码表包含作者、发表年份、论文题目、出版属性、样本大小、相关系数、标准误、均值、标准差、政策类型、领导人选择等条目。为避免人为编码的误差,笔者采用两名研究者重复编码(间隔30天)的方式进行两次编码。其中,第一次编码一致性达到85.714%,对结果不一致之处由一位教授进行评定,直到全部达成共识;第二次编码结果为只有一篇文献不同,因其中一名研究者编码操作错误导致,随即进行调整。接着,本研究采用相关系数 r 值作为荟萃分析中的效应

值。此外，由于很多政策创新扩散的研究并未汇报相关系数，需要先对 β 值、 t 值或 F 值等效应值进行转化。同时，考虑到这些效应值多是非正态的，需要将其转化为 Fisher's Z 值。然后，将 Fisher's Z 值加权平均可得到总体效应值。计算公式为：

$$Z_r = 0.5 * \ln\left(\frac{1+r}{1-r}\right), V_z = \frac{1}{N-3}, SE_z = \sqrt{V_z}, W = N-3 \quad (1)$$

式（1）中， r 为相关系数， Z_r 代表转化后的 Fisher's Z 值， V_z 为方差， SE_z 为标准误， W 为方差权重的倒数， N 为样本量（Chambers, 2004）。按照荟萃分析的换算公式，将不同效应值进行统一，并最终用量化数据来直观展示变量关系。根据转化结果，可以发现被纳入荟萃分析的文献共有 107 个效应值。最后，依次进行发表偏倚、异质性、主效应和调节效应检验。

四、研究结果

（一）发表偏倚检验

发表偏倚检验主要是为了保证荟萃分析所纳入的研究能够代表总体研究，而不至于偏差过大而引起荟萃分析结论不准确的问题。本文主要采用当前比较流行的漏斗图、Egger 线性回归、Begg 和 Mazumdar 秩相关法进行综合判断。在漏斗图中，可以初步发现所有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的散点，基本位于漏斗顶部，且相对均匀地分布在中线两侧^①。因此，可以初步认为荟萃分析不存在较为严重的发表偏倚。

进一步地，在 Egger 线性回归检验结果中，如果截距项不等于 0 且双尾显著性水平大于 0.05，则意味着没有达到显著，可以认定为发表偏倚不严重。从各个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的检验方程结果可知，其截距项估计值均不为 0，年龄（ $p=0.863$ ）、任期（ $p=0.820$ ）、任职来源（ $p=0.505$ ）和行政级别（ $p=0.284$ ）的双尾显著性水平均高于 0.05，因此认为发表偏倚不严重。其中，学历的双尾显著性水平为 0.003，稍低于 0.005。但最终结合 Begg 和 Mazumdar 秩相关法检验结果，学历与政策创新扩散的 Tau 值不为 0 且双尾显著

^① 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不展示漏斗图，有需要的读者可以联系作者获取。

性水平大于 0.05, 进一步可以认为发表偏倚并不严重^①。综上所述, 本次荟萃分析存在较好的信度和效度, 分析结论是有效的 (见表 1)。

表 1 发表偏倚检验结果

检验	年龄	任期	学历	任职来源	行政级别
Egger 线性回归					
截距项 <i>Intercept</i>	1.281	-1.221	11.725	-4.746	14.960
双尾显著性 <i>p</i>	0.863	0.820	0.003	0.505	0.284
Begg 和 Mazumdar 秩相关法					
<i>Tau</i> 值	0.003	-0.020	0.318	-0.164	0.348
双尾显著性 <i>p</i>	0.982	0.889	0.211	0.315	0.013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二) 异质性检验

由于不同样本来自不同研究情境, 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每个研究的效应值存在内部差异。如果忽略研究情境的前提假设, 对所有效应值进行整合分析, 则容易产生偏差。例如, 有的样本测量的是党委书记的特质, 而有的样本则使用行政长官的特质, 这就造成变量间关系的效应值出现很大的异质性。因此, 需要对效应值进行异质性检验, 来识别和判断效应值的异质性程度, 为进一步开展调节效应检验提供前提条件。为此, 笔者采用 *Q* 统计量和 I^2 统计量进行综合判断。一般认为, 如果 *Q* 统计量的双尾显著性小于 0.001 或者 I^2 统计量接近 100 (通常认为 25、50 和 75 分别代表低、中、高异质性), 就认为荟萃分析中的效应值存在非常大的差异, 意味着变量之间存在调节变量, 需要开展进一步的调节变量分析。如表 2 所示, 所有地方领导人特质的 *Q* 统计量的双尾显著性水平平均小于 0.001, 且 I^2 统计量都大于 75, 则可以认为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之间受到研究特征变量的影响, 需要进行调节效应分析。

表 2 异质性检验结果

检验	年龄	任期	学历	任职来源	行政级别
<i>Q</i> 统计量	1647.516***	840.578***	86.507***	822.789***	3378.960***
I^2 统计量	98.483	97.145	89.596	97.691	99.260

注: *** 表示结果在 0.001 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① 审稿专家对行政级别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发表偏倚结果提出了质疑。对此, 笔者进一步开展了失安全系数检验, 发现双尾 *p* 值为零且失安全系数为 7574, 表明不存在严重的发表偏倚问题。出于行文简约性的要求, 不再将失安全系数结果展示在文章当中, 有需要的读者可以联系作者获取检验结果。

(三) 主效应检验

表3展示了不同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关系的主效应检验结果。按照公共政策领域的主流做法,本研究采用随机效应模型进行检验。这是因为相较于偏理想化的固定效应模型,随机效应模型被认为与现实的吻合程度更高,更符合研究样本异质性程度高的基本设定。研究表明,年龄与政策创新扩散关系的整合效应值 ρ 为 -0.014 ,呈弱负相关关系,但其95%置信区间为 $[-0.217, 0.191]$,该区间包含0,且对应的Z值统计量(-0.128)的显著性水平P为0.898,结果不显著,与预期不相符合,故假设1没有得到验证;任期与政策创新扩散关系的整合效应值 ρ 为0.158,其95%置信区间为 $[0.005, 0.304]$,该区间不包含0,对应的Z值统计量(2.022)的显著性水平P为0.043,结果显著,但与假设恰恰相反,故假设2未得到支持;学历与政策创新扩散关系的整合效应值 ρ 为0.001,其95%置信区间为 $[-0.116, 0.119]$,该区间包含0,且对应的Z值统计量(0.019)的显著性水平P为0.984,结果不显著,故假设3没有得到验证;任职来源与政策创新扩散关系的整合效应值 ρ 为0.23,其95%置信区间为 $[0.044, 0.4]$,该区间不包含0,对应的Z值统计量(2.416)的显著性水平P为0.016,结果显著,故假设4得到支持;行政级别与政策创新扩散关系的整合效应值 ρ 为0.404,其95%置信区间为 $[0.153, 0.605]$,该区间不包含0,对应的Z值统计量(3.069)的显著性水平P为0.002,结果显著,故假设5得到支持。

表3 荟萃分析主效应结果

变量	k	N	r	ρ	95% 置信区间		80% 置信区间		Z 值	P 值	模型
					下限	上限	上限	下限			
年龄	26	6046	-0.001	-0.014	-0.217	0.191	-0.148	0.121	-0.128	0.898	随机
任期	25	5832	0.144	0.158	0.005	0.304	0.058	0.255	2.022	0.043	随机
学历	10	2787	-0.048	0.001	-0.116	0.119	-0.076	0.078	0.019	0.984	随机
任职来源	20	4764	0.216	0.230	0.044	0.400	0.109	0.343	2.416	0.016	随机
行政级别	26	7065	0.241	0.404	0.153	0.605	0.244	0.542	3.069	0.002	随机

注:k表示效应值个数,N表示样本量,r表示未经测量误差修正的样本平均相关系数, ρ 表示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的整合效应值,95%置信区间为基于修正的真实相关系数的95%置信区间,80%置信区间为基于修正的真实相关系数的80%置信区间,Z值和P值表示双尾检验结果。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四) 调节效应检验

1. 政策类型的调节效应检验

表4展示了随机模型下政策类型对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结果表明,政策类型在年龄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中发挥显著调节作用($Q_B = 5.991, p < 0.05$)。在社会治理创新类政策($k = 18$)中,尽管年龄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不显著,但表现出一定的正相关关系($\rho = 0.140$),95%置信区间为 $[-0.081, 0.348]$;在政府体制改革类政策中($k = 8$),年龄与政策创新扩散表现出显著的负相关关系($\rho = -0.343, p < 0.05$),95%置信区间为 $[-0.597, -0.026]$ 。政策类型对任期($Q_B = 0.770$)、学历($Q_B = 3.160$)、任职来源($Q_B = 0.197$)、行政级别($Q_B = 0.045$)与政策创新扩散的调节作用并不显著。当然,尽管政策类型在行政级别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中不显著,但具体到社会治理创新类政策中($k = 21$)却表现出显著的调节作用($\rho = 0.416, p < 0.05$),95%置信区间为 $[0.131, 0.638]$ 。因此,假设6得到部分验证。

表4 政策类型对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关系的调节作用

变量	政策类型	k	N	ρ	SD_p	95%置信区间		Q_w	Q_B
						下限	上限		
年龄	社会治理创新类	18	4154	0.140	0.420	-0.081	0.348	696.536***	5.991*
	政府体制改革类	8	1892	-0.343*	0.580	-0.597	-0.026	548.286***	
任期	社会治理创新类	16	3776	0.106	0.416	-0.089	0.294	617.268***	0.770
	政府体制改革类	9	2056	0.248	0.339	-0.009	0.475	210.731***	
学历	社会治理创新类	8	2329	-0.045	0.150	-0.156	0.067	56.040***	3.160
	政府体制改革类	2	458	0.183	0.000	-0.043	0.391	0.041	
任职来源	社会治理创新类	11	2662	0.192	0.434	-0.067	0.426	456.144***	0.197
	政府体制改革类	9	2102	0.275	0.434	-0.006	0.515	349.210***	
行政级别	社会治理创新类	21	5447	0.416*	0.782	0.131	0.638	3145.048***	0.045
	政府体制改革类	5	1618	0.351	0.412	-0.264	0.763	216.271***	

注:采用随机模型。*、**、***分别表示结果在0.05、0.01和0.001的水平上统计显著,k表示效应值个数,N表示样本量,r表示未经测量误差修正的样本平均相关系数, ρ 表示经测量误差修正的真实相关系数, SD_p 为真实相关系数的标准差,95%置信区间为基于修正的真实相关系数的95%置信区间, Q_w 为组内异质性检验统计量, Q_B 为组间异质性检验统计量。下同。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2. 出版属性的调节效应检验

表5展示了出版属性对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可以看到,出版属性在年龄($Q_B = 1.136$)、任期($Q_B = 0.338$)、学历($Q_B = 2.177$)、任职来源($Q_B = 0.033$)、行政级别($Q_B = 2.974$)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中均没有发挥显著的调节作用。但具体到出版发表的研究样本($k = 17$)中,发现出版属性对任职来源与政策创新的关系发挥了显著调节作用($\rho = 0.237, p < 0.05$),95%置信区间为 $[0.263, 0.729]$ 。同时,在出版发表的研究样本($k = 17$)中,出版属性对行政级别与政策创新的关系发挥了显著调节作用($\rho = 0.536, p < 0.001$),95%置信区间为 $[0.263, 0.729]$ 。当然,综合上述结果来看,假设7并未得到验证。

表5 出版属性对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关系的调节作用

变量	出版属性	k	N	ρ	SD_ρ	95% 置信区间		Q_w	Q_B
						下限	上限		
年龄	出版	17	3961	-0.101	0.592	-0.340	0.151	1294.601***	1.316
	未出版	9	2085	0.149	0.352	-0.193	0.458	233.409***	
任期	出版	17	4254	0.127	0.412	-0.063	0.308	683.290***	0.338
	未出版	8	1578	0.224	0.335	-0.052	0.469	156.397***	
学历	出版	4	1457	-0.094	0.220	-0.251	0.069	51.069***	2.177
	未出版	6	1330	0.066	0.048	-0.070	0.200	7.548	
任职来源	出版	17	4139	0.237*	0.458	0.030	0.424	817.830***	0.033
	未出版	3	625	0.189	0.047	-0.300	0.599	2.892	
行政级别	出版	17	4767	0.536***	0.808	0.263	0.729	2897.430***	2.974
	未出版	9	2298	0.105	0.292	-0.335	0.507	178.126***	

注: *、**、*** 分别表示结果在 0.05、0.01 和 0.001 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资料来源: 作者自制。

3. 领导人选择的调节效应检验

表6汇报报告了领导人选择对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关系的调节作用结果。可以看到,在组间异质性检验统计量中,领导人选择对年龄($Q_B = 0.205$)、任期($Q_B = 0.128$)、学历($Q_B = 0.408$)、任职来源($Q_B = 0.029$)、行政级别($Q_B = 0.667$)与政策创新扩散的调节作用均未达到显著性水平。因此可以认为,领导人选择这一变量对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的调节作用是不显著的,即假设8没有得到验证。

表6 领导人选择对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关系的调节作用

变量	领导人选择	k	N	ρ	SD _p	95% 置信区间		Q _w	Q _B
						下限	上限		
年龄	党委书记	8	2054	-0.086	0.371	-0.435	0.285	249.983 ***	0.205
	行政长官	18	3992	0.019	0.610	-0.231	0.267	1385.735 ***	
任期	党委书记	8	2021	0.117	0.253	-0.158	0.376	118.063 ***	0.128
	行政长官	17	3811	0.178	0.449	-0.013	0.356	720.031 ***	
学历	党委书记	3	792	0.058	0.125	-0.150	0.261	10.097 *	0.408
	行政长官	7	1995	-0.024	0.188	-0.160	0.114	62.213 ***	
任职来源	党委书记	6	1672	0.205	0.466	-0.145	0.509	304.615 ***	0.029
	行政长官	14	3092	0.240 *	0.423	0.011	0.445	513.246 ***	
行政级别	党委书记	1	234	0.761	0.000	-0.379	0.984	0.000	0.667
	行政长官	25	6831	0.384 *	0.711	0.125	0.595	3287.478 ***	

注：*、**、*** 分别表示结果在 0.05、0.01 和 0.001 的水平上统计显著。

资料来源：作者自制。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对 49 篇中国情境下的政策创新扩散文献进行了荟萃研究，在整合 107 个效应量、12044 个样本的基础上，实现了对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关系的系统性文献综述。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 任期、任职来源与行政级别对政策创新扩散具有显著的积极效应

一是在任期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上，已有研究长期存在着地方领导人的任期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呈现倒 U 形关系的假设，但却很少有研究能够通过实证验证。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研究认为，任期与政策创新扩散是负相关关系。本次荟萃分析表明，中国情境下地方领导人任期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表现出正相关关系，这虽然与本研究假设是相反的，却与部分研究的结论是一致的（例如，韩啸、吴金鹏，2019；刘佳、刘俊腾，2020）。这可能是因为在中国情境下，地方领导人的晋升动机是强烈而持续的。地方领导人在任期之末，也可能会为了寻求连任和晋升而保持较强的创新意愿。同时，任期之末的地方领导人有着更为丰富的执政经验和资源，这也在其政策创新扩散上发挥着促进效应。因此，我们应警惕已有实证研究中关于任期与政策创新扩散的负相关关系或倒

U形关系,进一步表明此类经济学领域的观点在公共政策领域的适用性可能是有限的 (Mei & Wang, 2017)。

二是任职来源与政策创新扩散呈现出正相关关系,这不仅与研究假设一致,而且与多数已有研究结论相同 (朱旭峰、张友浪, 2015)。相较于西方体制内比较固定的政务官,中国政府施行干部交流制度,为地方领导人的跨区域流动提供了合法性 (朱光喜、陈景森, 2019)。地方领导人的任职来源如果是上级政府或同级政府,往往意味着新的地方领导人拥有更强大的社会资本和更具战略性的眼光,存在较为强烈的政绩需求 (Teodoro, 2010)。同时,这种跨区域的官员流动为地方领导人知识和经验的流动提供了渠道,有助于促进增量知识与存量知识的互动,推动新的知识进入到政府系统,进而从内部层面催生政策创新扩散 (Chien, 2008)。也正因如此,自上而下的任职来源激发了政策创新扩散的内生动力,为官员推动政策创新扩散提供了较好的支持效应。同时,同级调动的官员也具有更为丰富的执政经验,这也有利于促进政策创新扩散。

三是行政级别与政策创新扩散的正相关关系也得到了本次荟萃分析的支持,这与马亮、朱旭峰等学者的研究结论一致 (Ma, 2013; 朱旭峰、赵慧, 2016)。在中国,不同城市的行政级别存在显著差异,既有数量最大的地级市,也有高于地级市的副省级城市 (广州、大连、沈阳等)、省级城市 (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四大直辖市),以及各省的省会城市为准副省级城市,这在西方一些国家是不存在的。不同行政级别的城市意味着城市的政治地位、人口资源等条件存在显著差异。一般而言,地方领导人行政级别越高,权力越大,对于政策创新扩散的控制权越强,领导偏好对于政策创新扩散的作用效应就越大。特别是省会城市或副省级城市的主要领导人一般是省级领导,这使得其辖区内的政策采纳决定空间更大。因此,在一些自上而下的创新政策中,行政级别越高的城市在政策创新扩散中表现得可能越积极。

2. 年龄、学历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并不显著

一是年龄与政策创新扩散之间的关系虽然不显著,但仍表现出假设当中认为的负相关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年龄增长对政策创新扩散的抑制效应。但同时两者关系不显著,也说明已有研究关于两者关系的结论可能是特定情境和样本的结果,其结论的推广性值得警惕。对此,笔者也试图按照倒U形关系假设进行检验,但在建构荟萃回归分析模型后,结果显示仍然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进一步说明两者的关系亦不符合倒U形解释。

二是学历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不显著,可能与本研究纳入荟萃分析的文献数量有关。已有研究较少地对学历与政策创新扩散之间的关系进行检验,导致荟萃分析当中对于两者关系检验的独立文献只有9篇,这可能对荟萃分析结

论的信度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这一点在前文的发表偏倚检验中也得到了体现。因此,对于学历和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未来还有待更多的实证研究进行检验。

3. 政策类型具有显著调节效应,出版属性和领导人选择则发挥部分调节效应

一是在政策类型的调节效应检验上,荟萃分析结果表明政策类型在年龄和学历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中具有显著的调节作用。其中,在政府体制改革类政策中,年龄与政策创新扩散具有显著的负相关关系,说明年龄越小的领导人对于政策创新扩散的概率越大。这与本研究关于年龄特质的研究假设一致,启示在于推进政府体制改革类政策创新扩散时,应该选择相对年轻的领导人。此外,尽管整体效应值上政策类型对学历与政策创新扩散的调节作用显著,但具体而言,无论是在社会治理创新类还是政府体制改革类政策中,这种调节作用均不显著,这一现象同样值得进一步研究。

二是在出版属性的调节效应检验上,可以看到在出版的样本文献中,出版属性对任职来源、行政级别与创新扩散的调节作用是显著的,其他关系不显著。例如,较之未出版文献,出版文献在行政级别与政策创新扩散的正相关关系上表现得更强($\rho_{\text{出版}} = 0.536$, $\rho_{\text{未出版}} = 0.105$),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出版文献的调节效应是存在的。而未出版文献多为硕博学位论文,可能由于研究质量和可靠性的问题,导致测量和结论的准确性受损。

三是在领导人选择的调节效应检验上,发现荟萃分析结果与研究假设并不一致。上述分析表明,在政策创新扩散研究的整体性样本中,无论选择党委书记还是行政长官作为地方领导人,都不影响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的关系,这体现出中国情境下两类领导人对于政策创新扩散的异质性影响并不大。然而,在行政长官的研究样本中,任期、任职来源和行政级别与政策创新扩散的相关关系却达到了显著性水平。因此可以认为,相较于党委书记,选择行政长官的研究效果可能会更好。这主要在于,尽管党委书记是“一把手”,但诸如智慧城市、垃圾分类、创新型城市、河长制等政策多以政府的名义发布,故而行政长官在政策创新扩散上可能发挥着更大的作用。

(二) 研究贡献与不足

本文的边际理论贡献在于,首次用荟萃分析方法检验了中国情境下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之间的关系,为二者之间的关系认知分歧提供了一个方向性的共识,有助于为后续政策创新扩散与其他变量的关系研究提供理论指引。本文在对49篇中英文的政策创新扩散研究进行整合性分析的基础上,逐步按照发表偏倚检验、异质性检验、主效应检验和调节效应检验,较为系统地梳理了地方领导人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之间的关系,发现年龄特质、任期特质与

政策创新扩散的负相关关系没有得到有效支持,学历特质与政策创新扩散的正相关关系也没有得到有效支持,而任职来源和行政级别与政策创新扩散的正相关关系则得到了验证。同时,本研究也进一步说明了政策类型的部分调节作用。由此可见,本研究从更为科学的角度评估了两者之间的关系,对于从经验层面认识中国领导人特质在政策创新扩散上的作用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上述研究提供了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是要审慎地看待现有研究关于地方领导人特质对政策创新扩散影响的实证结果。由于样本选择、方法运用、变量测量等方面的原因,这些研究结论的适用性和准确性难以得到完全保证。尤其是在政策创新扩散的顶层设计上,还应该结合现实情况综合考虑。二是在后续政策创新扩散的研究中,也应更加审慎地提出这些变量间关系的研究假设,这是因为已有文献中的研究结论可能存在特定的适用边界和局限性,具体应充分根据研究情境来思考两者的关系,以提供扎实的理论证据。

本研究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一是仅仅研究了政策类型、出版属性和领导人选择三个调节变量,对这些变量也多采用了离散型赋值的处理方式,只解释了荟萃分析中高异质性的部分原因。从荟萃分析调节效应检验结果中可以发现,很多组内异质性统计量都是显著的,这说明组内还存在其他未识别的潜在调节变量。后续研究可以开发探索出更多新的调节变量,以及采用连续性赋值的方式来处理变量,对未解释的异质性部分进行新的解释。二是本文并未对比分析西方情境中的政策创新扩散研究,研究结论的适用性边界可能比较明显。因此,未来研究可以聚焦西方情境中的政策创新扩散研究进行新的荟萃分析,并与本研究进行比较对话,以回应政策创新扩散研究中持续不断的争论。

参考文献

- 董志霖、闫泽华 (2020). “倒U形”关系可靠吗? 对官员任期与经济绩效关系文献的荟萃回归分析. *公共管理评论*, 2: 44-64.
- Dong, Z. L., & Yan, Z. H. (2020). Is the Inverted U-shaped Relation Reliable? A Meta-Regression Analysis on the Literature of Relationship Between Governors' Tenure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China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2: 44-64. (in Chinese)
- 韩万渠 (2019). 决策咨询制度扩散机制及其区域差异: 基于中国城市政府的实证(1983—2016). *公共管理与政策评论*, 4: 3-17.
- Han, W. Q. (2019). The Diffusion Mechanism of Policy Advisory System and Its Regional Differenc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Chinese Urban Government (1983-2016). *Public Administration and Policy Review*, 8(4): 3-17. (in Chinese)
- 韩啸、吴金鹏 (2019). 政府信息公开制度扩散的多重逻辑——面向中国省份的事件史分析.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5: 489-496.
- Han, X., & Wu, J. P. (2019). Multiple Logics of the Diffusion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Disclosure System: An Event History Analysis of Chinese Provinces. *Journal of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5: 489-496. (in Chinese)

- 江艇、孙鲲鹏、聂辉华 (2018). 城市级别、全要素生产率和资源错配. *管理世界*, 3: 38-50.
- Jiang, T., Sun, K. P., & Nie, H. H. (2018). Administrative Rank,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and Resource Misallocation in Chinese Citi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34(3): 38-50. (in Chinese)
- 雷叙川、王娜 (2019). 地方政府间的政策创新扩散——以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制度为例. *地方治理研究*, 4: 2-19.
- Lei, X. C., & Wang, N. (2019). Diffusion of Policy Innovation among Local Governments: A Case Study of the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Urban Domestic Waste. *Local Governance Research*, 4: 2-19. (in Chinese)
- 刘佳、刘俊腾 (2020). “最多跑一次”改革的扩散机制研究——面向中国 294 个地级市的事件史分析. *甘肃行政学院学报*, 4: 26-36.
- Liu, J. & Liu, J. T. (2020). A Study on the Diffusion Mechanism of “No More than One Visit for One Item” Reform: An Events History Analysis for 294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China. *Journal of Gansu Administration Institute*, 4: 26-36. (in Chinese)
- 刘景江 (2009). 地方政府创新: 概念框架和两个向度. *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4: 35-42.
- Liu, J. J. (2009). Local Government Innovation: Conceptual Framework and Two Dimensions.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Edition)*, 4: 35-42. (in Chinese)
- 马亮 (2015). 公共服务创新的扩散: 中国城市公共自行车计划的实证分析. *公共行政评论*, 3: 51-78.
- Ma, L. (2015). The Diffusion of Public Service Innovation: An Empirical Analysis of Public Bicycle Programs in Chinese Citie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3: 51-78. (in Chinese)
- 唐慧、王印红 (2021). 政策爆发的多重逻辑: 基于中国地级市“人才新政”的事件史分析. *中国人力资源开发*, 8: 115-128.
- Tang, H., & Wang, Y. H. (2021). Multiple Logics for Policy Outbreak: Event History Analysis Based on the “New Talent Policy” of Prefecture-Level City in China. *Human Resources Development of China*, 8: 115-128. (in Chinese)
- 王法硕、张桓朋 (2021). 重大公共危机事件背景下爆发式政策扩散研究——基于健康码省际扩散的事件史分析. *电子政务*, 1: 21-31.
- Wang, F. S., & Zhang, H. P. (2021). A Study of Explosive Policy Diffusion in the Context of Major Public Crisis Events: An Event History Analysis of Inter-Provincial Diffusion of Health Codes. *E-Government*, 1: 21-31. (in Chinese)
- 王洪涛、陈洪侠 (2017). 我国智慧城市创新扩散演进机理及启示——基于 38 个城市的事件史分析. *科技进步与对策*, 3: 44-48.
- Wang, H. T., & Chen, H. X. (2017). Evolution Mechanism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of Smart Cities Innovation Diffusion in Our Country: Based on the Event History Analysis of 38 Cities. *Science & Technology Progress and Policy*, 3: 44-48. (in Chinese)
- 王贤彬、徐现祥 (2008). 地方官员来源、去向、任期与经济增长——来自中国省长省委书记的证据. *管理世界*, 3: 16-26.
- Wang, X. B., & Xu, X. X. (2008). Local Officials' Origin, Destination, Tenure and Economic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ese Governors and Provincial Party Secretari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3: 16-26. (in Chinese)
- 吴克昌、吴楚泓 (2022). 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背景下政策响应速度差异研究——基于 283 个城市复工复产政策的事件史分析. *北京工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6: 67-81.
- Wu, K. C., & Wu, C. H. (2022). Research on Differences in Policy Response Speed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Major Public Health Emergencies: Event History Analysis Based on Policies for Resumption of Work and Production in 283 Cities. *Journal of Beij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s Edition)*, 6: 67-81. (in Chinese)
- 朱光喜、陈景森 (2019). 地方官员异地调任何以推动政策创新扩散? ——基于议程触发与政策决策的比较案例分析. *公共行政评论*, 4: 124-142.
- Zhu, G. X., & Chen, J. S. (2019). Local Geographical Leadership Mobility and Policy Innovation Diffusion.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4: 124-142. (in Chinese)
- 朱旭峰、张友浪 (2015). 创新与扩散: 新型行政审批制度在中国城市的兴起. *管理世界*, 10: 91-105.
- Zhu, X. F., & Zhang, Y. L. (2015).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the Rise of a New Administrative Approval System

- in Chinese Citi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World*, 10: 91 – 105. (in Chinese)
- 朱旭峰、赵慧 (2016). 政府间关系视角下的社会政策扩散——以城市低保制度为例 (1993—1999). *中国社会科学*, 8: 95 – 116.
- Zhu, X. F., & Zhao, H. (2016). The Diffusion of Social Polici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governmental Relations: A Case Study of the Urban Subsistence Allowance (1993 – 1999). *Social Sciences in China*, 8: 95 – 116. (in Chinese)
- 朱亚鹏、丁淑娟 (2016). 政策属性与中国社会政策创新的扩散研究. *社会学研究*, 5: 88 – 113.
- Zhu, Y. P., & Ding, S. J. (2016). Policy Attributes and Social Policy Diffusion in China. *Sociological Studies*, 5: 88 – 113. (in Chinese)
- 朱亚鹏、肖捷文 (2014). 政策企业家与社会政策创新. *社会学研究*, 3: 56 – 76.
- Zhu, Y. P., & Xiao, D. W. (2014). Policy Entrepreneur and Social Policy Innovation. *Sociological Studies*, 29(3): 56 – 76. (in Chinese)
- Bantel, K. A., & Jackson S. E. (1989). Top Management and Innovations in Banking: Does the Composition of the Top Team Make a Difference?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10(S1): 107 – 124.
- Chambers, E. A. (2004). An Introduction to Meta-Analysis with Articles from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1992 – 2002). *The Journal of Educational Research*, 98(1): 35 – 45.
- Chien, S. S. (2008). The Isomorphism of Local Development Policy: A Case Study of the Formation and Transformation of National Development Zones in Post-Mao Jiangsu, China. *Urban studies*, 45(2): 273 – 294.
- Damanpour, F., & Schneider, M. (2009). Characteristics of Innovation and Innovation Adoption in Public Organizations: Assessing the Role of Manager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19(3): 495 – 522.
- Fagard, R. H., Staessen, J. A., & Thijs, L. (1996).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of the Meta-Analysis Approach. *Journal of Hypertension*, 14(2): S9 – S13.
- Glass, G. V., (1976). Primary, Secondary, and Meta-Analysis of Research. *Educational Researcher*, 5(10): 3 – 8.
- Graham, E. R., Shipan, C. R., & Volden, C. (2013). The Diffusion of Policy Diffusion Research in Political Science.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3(3): 673 – 701.
- Kearney, R. C., Feldman, B. M., & Scavo, C. P. F. (2000). Reinventing Government: City Manager Attitudes and Action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60(6): 535 – 548.
- Kimberly, J. R., & Evanisko, M. J. (1981). Organizational Innovation: The Influence of Individual, Organizational, and Contextual Factors on Hospital Adoption of Technological and Administrative Innovations.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24(4): 689 – 713.
- Ma, L. (2013). The Diffusion of Government Microblogging: Evidence from Chinese Municipal Police Bureaus.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15(2): 288 – 309.
- Makse, T., & Volden, C. (2011). The Role of Policy Attributes in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73(1): 108 – 124.
- Mei, C., & Wang, X. (2017). Political Incentives and Local Policy Innovations in China. *Journal of Chinese Political Science*, 22(4): 519 – 547.
- Mintrom, M. (1997). Policy Entrepreneurs and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41(3): 738 – 770.
- Pearson, K., (1904). Report on Certain Enteric Fever Inoculation Statistics. *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 2288(2): 1243 – 1246.
- Shipan, C. R., & Volden, C. (2012). Policy Diffusion: Seven Lessons for Scholars and Practitioners.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 72(6): 788 – 796.
- Teodoro, M. P. (2010). Contingent Professionalism: Bureaucratic Mobility and the Adoption of Water Conservation Rates.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0(2): 437 – 459.
- Vroom, V. H., & Pahl, B. (1971). Relationship Between Age and Risk Taking among Managers.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55(5): 399 – 405.

- Walker, J. L. T. (1969). The Diffusion of Innovations among the American State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63(3): 880 – 899.
- Wallach, M. A., & Kogan, N. (1961). Aspects of Judgment and Decision Making: Interrelationships and Changes with Age. *Behavioral science*, 6(1): 23 – 36.
- Zhu, X., & Zhang, Y. (2016). Political Mobility and Dynamic Diffusion of Innovation: The Spread of Municipal Pro-Business Administrative Reform in China.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 26(3): 535 – 551.
- Zhu, X., & Zhao, H. (2018). Recognition of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of Welfare Policy: Alleviating Urban Poverty in Chinese Cities During Fiscal Recentralization. *Governance*, 31(4): 721 – 739.

责任编辑：张雪帆